

否定与反证：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技理性批判中的社会动力观*

郑忆石 祁程

[摘要]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基于社会批判理论而展开的科技理性批判，几乎一致视科学技术为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并从区别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探寻导致“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基础，从滥用科学技术导致的自然、社会、人的异化等众多角度，在揭示科学技术的负向效应中，直接否定了它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拒斥不等于漠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批判，不仅从反面证明了科学技术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透过其理论家的科技理性批判，可见其中对科学技术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的认可。

[关键词]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 科技理性批判 社会发展动力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2) 01-0093-07

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基于人道主义和主体价值立场，从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的维度，对科技理性所展开的激情而富有深度的批判，而不存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的肯定，它甚至从根本上拒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一传统观点。然而，细究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我们发现，其拒斥并没有摆脱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梦魇”的纠缠。

一、科学技术：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

安德鲁·芬伯格认为，批判理论的特征是对合理性的批判，它“从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开始，然后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和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①。秉承马克思理论的反思批判特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将批判之矛直指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异化”，并在将靶心锁定于科学技术中，表明了其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的否定态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 11BZX0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金项目（项目号 2009BZX001）“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霍克海默从分析和区别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入手，通过批判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揭示了科学思维方式的现代特征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在他看来，虽然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科学被看作人类的生产力之一，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科学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其原因，既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使科学发生了“变异”，即从人类解放的工具蜕化为脱离人、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更在于其内在思维方式：从静态而非动态的视域考察事物，具有内容和方法上的“肤浅性”特征^②，这导致科学不仅难以把握动态发展的社会，解决社会生活问题，而且难以理解作为科学缔造者的主体——“人”的自足意识、理性、生存状态等等；从肯定的而非从否定的维度考察事物，具有“意识形态性”特征，这导致科学成为“掩盖社会真实本质”^③，具有欺骗性的肯定文化和人类行为方式；从片面理性形式而非从社会整体把握事物，具有“工具性”特征，即总是以是否执行职能的功利原则和理性标准为尺度，力求获得实现预期行为目标的认识，这导致了实用主义，使科学理性成为仅仅追求日常生活目标的工具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考察”^④科学思维方式的这种特征，已经渗入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致使人们对社会对象的研究也如自然科学：割裂研究对象与人对其认识之间的关系，或运用归纳法原则，得出一般概念和普遍规律，或根据现象学，力求发现独立于经验的本质规律，“而不是把它看作在其历史发展中，处于真实、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东西”^⑤。总之，由近代发端，以静态、肯定、形式为特征的科学思维方式，经过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强化和误导，已经发展为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由于它假设了孤立的、抽象理解了的人这个概念，因而贬低了对社会进程作理论把握的重要性”^⑥，便不仅阻碍了人类认识的进步，而且阻碍了社会发展。就此，霍克海默否定了科学思维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价值。

科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如何？何者才是社会变革的动力？霍克海默认为，如同我们不能使自己的感知独立于它们的社会形成过程，感知客体和感知行为，都不过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一样，科学不过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无论其活动还是其研究对象，都处于社会之中，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⑦科学不是社会变革的动力，而社会变革才是科学变革最强大的动力。

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如何？以启蒙理性为标识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何效应？霍克海默指出，科学所具有的启蒙精神，无疑是人类解放、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却日益表明：启蒙内在地蕴含着悖论，既使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又使人因胜利而招致灾难^⑧。因此，那伴随启蒙理性而来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效应：既提高了人类控制、征服自然的能力，确立了人类在整个世界中的“主权”地位，大大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生产效率，有力推动了社会发展，又成为为物质的或社会的工艺效劳的手段、纯粹谋利的工具，只关心由此带来的物质效果而漠视人的价值追求和目的，放弃对任何意义的探求，将人的灵魂物化了^⑨。

科学与人的关系如何？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对人的发展有何影响？霍克海默指出，当工具性成为科学技术的唯一功能时，科学技术便在成为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时，消灭了人的个性，分离了作为总体的人，使人成为了机器，使人类被迫返回到了更原始的阶段。想象力萎缩了，思维领域和经验领域的分离在导致各自残缺不全的同时，思维变成了纯粹而又简单的有机中介，“人都是物质”^⑩。在科学与人类的关系中，不是科学为人类服务，而是人类为科学服务，“人”作为外在于科学的东西，不得不从属于科学。

可见，在霍克海默眼中，科学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其负向效应远远大于正向效应，科技理性的工具性一面，在导致“启蒙理性的自我毁灭”，人的价值遭到贬损的同时，也从根基上动摇和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至于阿多尔诺，则更是直接指出“成为方法和工具的生产力不能使人和人社会获得发展^⑩。

如果说，他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已经看到科技理性落入工具理性陷阱的原因，在于丧失了思维否定性的实证主义、数学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则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进而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探寻导致“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基础。

通过区分科学与哲学在理念^⑪、研究方法^⑫上的差异，并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基本精神为例，阿多尔诺批判了科技理性：受现实经济运转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的“自由”本质是决定论的，是“兼并一切非同一种性的那种同一性”^⑬。这种矛盾的“自由”在资产阶级那里只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它所以体现为意识形态，恰是假科学之名，借科学之手。既然科技理性只是从肯定性、事实性的视角认识、揭示事物，它就只是一种“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这种不具有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具有批判的眼光，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出社会的弊端。

与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不同，阿多尔诺反对以征服自然为前提的生产力观念。在阿多尔诺看来，马克思在实践概念上的根本性革命，是把由德国古典哲学创立的“精神实践”，回归到了现实生活的领域，赋予它以客观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内涵和本质，然而，由于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主要指物质生产实践，而“只有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使人们不再被吞没在那种被需求强迫的实践中、那种在人们身上被自动化的实践中，人们便有可能人道地进行沉思”^⑭，马克思自然将生产力的发展看作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样一种基于物质生产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力发展，因其成为“方法和工具性的”东西，不仅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反而使人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成为物欲的工具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样，阿多尔诺明确反对基于工具理性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工具理性的生产力，必然导致对自然控制的“人类中心主义”。阿多尔诺指出，那种强调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第一”观，不过是工业文明的特产，是生产主义，它导致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在强权的语境下，产生出“同一性的圆圈”^⑮。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源于哲学上“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同一性”则是支配、奴役、控制性思维模式的集中表现。当人类从这种“同一性”的思维模式看待自然时，必然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而力图控制、奴役、支配它。这种使人处于与自然对立地位的观念，也不能真正使人获得自由。他批评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实践观“认可了像对自然的绝对控制这样的大资产阶级纲”^⑯。显然，阿多尔诺在反对以征服自然为前提的生产力观念的同时，也否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

在严格区分哲学与科学的同时，阿多尔诺通过着重考察哲学对现实的揭露和展示，以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第二自然”的批判^⑰，表明了自己对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解：社会历史并不一定表现为融会贯通的一致性，而是差异性、偶然性等多种样态^⑱；人不是纯理性的人，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⑲；人也不是“大写的”的人、“类本质”的人，而是现实的、偶然性的、具体的个体^⑳。社会的发展，就是个体的解放。而个体的解放，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如何实现个体的解放和发展？个体解放和发展又如何推动社会发展？阿多尔诺认为，个体的解放不在于“完全革命”之类的词句，而在于理论的批判。而理论批判的主体和出发点，是具有现实性、偶然性的具体个体。通过强调“理性批判”的主体是现实的具体个体，承认具

体个体的批判思维能力是实现精神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超越即“彻底否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批判现实社会的武器中，阿多尔诺间接表明了他以具体个体的“理性批判”为核心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较之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批判，马尔库塞无疑更为长久、直接、尖锐和深刻，直指科技理性导致了启蒙的自我毁灭

基于人本主义的特定视角，马尔库塞通过揭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的影响和制约，否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了头号生产力。然而，这种“头号生产力”于“人”，不再是幸福源泉而是痛苦渊薮；这种“头号生产力”于“社会”，不再是发展动力而是意识形态控制工具。

作为“头号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

对“人”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解放“人”，反而使人更加异化，表现为：劳动越来越异化，人在劳动中被剥夺了劳动的真正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异化，其联系纽带被切断；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异化，变形为一种虚假的、幻想的“联合”^②；人与自身的关系越来越异化，其价值活动受到严重干扰^③，真、善、美的普遍的有效性被剥夺；人的需求越来越异化，“虚假的需要”使人的需要趋于单向度^④；人的自由越来越异化，被管理的、给定的、在强迫的总体框架内实现的自由，已经沦为“统治的有力工具”^⑤；人的思维越来越异化，只具有现存性、肯定性而丧失了超越性、否定性、批判性的向度^⑥。这样，本应是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促使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技术，虽然提高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创造了富裕的生活方式，却并未使人获得自由，并未改变人的命运，反而因对人的全面的管理和统治，使人变成了科学技术、物质消费的奴隶，退化为纯粹工具、降低到物的境地。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的人”的存在事实表明，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已经失去了其价值。

对社会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推动社会发展，反而使社会更加异化：它通过技术合理性，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⑦；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成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方向的内在的、自主的、决定性的力量；实现了社会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个人与社会自动、直接的“一体化”，在剥夺人们独立思想的同时，也剥夺了反对派的存在权利，“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⑧；实现了对社会文化的控制，在使文化商业化中，消解了“高层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差异^⑨，使文化完全成为一种丧失批判性、否定性的“单向度”的物质文化。

二、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尽管霍克海默通过批判科学思维方式的现代特征及其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然而，当他在确立认识论和文化批判的基本原则时，又通过揭示科学技术的双重维度（本体的、认识的），在表达对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双重解读中，通过强调科学局限性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霍克海默不仅没有完全否定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还间接承认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

在霍克海默看来，“科学也表现出双重矛盾”^⑩。科学的上述局限性，“并非出于科学对其理性特性的夸大，而是出于加在科学上的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本身又受到社会境况的日益僵化的制约”^⑪。我们区分科学与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用，不过是借以表明，它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

经济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当前，科学的力量映照出充斥着种种矛盾的经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所控制，然而在世界范围中，它又分崩离析、混乱不堪。它虽然更加发达，然而比以往更无力使人类摆脱困境”^⑧。因此，当我们谈论科学思维方式对人、社会的负面影响，当我们试图否定科学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作用时，我们除了应当辩证批判而非盲目崇拜地接受科学，除了应当从科学危机中看到其根源在于社会危机，除了应当“对科学危机的理解依赖于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境况的正确理论”即构建辩证理性思维，我们也应当承认，即便是在科学技术盛行的今天，“科学作为生产手段尚未适当地运用”^⑨。

由此，霍克海默又通过区分科学与科学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用中，以及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对科学造成的危害，而并未完全否定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至于阿多尔诺，虽然他对于由于科技理性的非批判性而导致的“启蒙理性的毁灭”、工具理性的泛滥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所反对的，显然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工具化的一面。在谈到“生产力的解放”时，他认为“‘解放’一词具有威胁的含意”^⑩，并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家因为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而“肆无忌惮地迫使人去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说明一旦当“技术的生产力在社会上很少受到阻碍，它在固定的生产关系中起作用，同时又不对这些生产关系发生太大影响”，一旦这种“生产力的解放同人之间承受的关系相分离，它也就开始被当作规则受到崇拜”^⑪。但即便如此，“生产力解放”中的“解放也不过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而不是它的咒符”，如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它是推动精神的发展，从原始社会的部落精神，向私有制为核心的文明时代个体化精神，再向基于个体化之后的集体主义转变的力量^⑫一样。换言之，阿多尔诺对于因科学技术本身而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长，以及这种发展和增长，对人类社会追求“自由”价值目标的作用，并未全盘否定。因而，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科学的社会动力作用。相反，在阿多尔诺看来，正是科学在管理、劳动分工中的运用，在大大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的政治、文化事业的生产效率，在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时候，促进社会在不断增长的事物和关系中，再生产自身，即对人与自然的开发，更为科学与合理，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当阿多尔诺谈到“世界史”时，他更是明确指出，“历史是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统一。社会不是不管它的对抗性，而是凭借着这种对抗性继续生存着。利益以及阶级关系构成了所有人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过程的动力，生产过程的首要性只有在万物寂灭之时才会消失”^⑬。可见，在强调社会历史的辩证“非统一性”，将主体的人的利益、阶级关系视为生产发展的动力时，阿多尔诺没有否认相反却承认了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源性、基础性地位。

可见，尽管阿多尔诺的上述表述，与他“理性批判”的初衷相悖，并与其批判主旨极其矛盾。然而，透过阿多尔诺“批判”的重重帷幕，其背后蕴藏的另类含意，又让人似曾相识。

尽管马尔库塞因其言辞激烈的科技理性批判，而似乎全然否认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价值。然而，当马尔库塞鉴于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承认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且已经成为头号生产力时，他便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其对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作用的矛盾心态。

当马尔库塞承认科学技术作为资本主义的头号生产力，它的发展增强了人开发、征服自然的能力时；当他承认正是自动化生产的发展使劳动者从机器的直接附庸中解放出来，“解放”为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时间、空间时，马尔库塞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科学技术对

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的作用。

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因沦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使人异化，阻碍了社会进步，但是又必须承认正是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为人的“自由”奠定了物质基础，“劳动必须先于劳动的减少，工业化必须先于人类需要和满足的发展。但正如一切自由有赖于对异己的必然性的征服一样，自由的实现也有赖于这一征服的技术”^⑧；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又在推动社会形态演变，即人被劳动工具奴役、社会被技术合理性控制的异化社会，向人获得摆脱、社会向消除控制的社会过渡中起着作用，“从‘按劳分配’过渡为‘按需分配’是由第一阶段决定的——不仅由第一阶段所创造的技术和物质基础，而且（这具有决定性意义！）是由创造技术和物质基础的方式所决定的。‘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应该启动那把自由人的历史与人的前历史区分开来的发展。这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先前的生产目标第一次变成了为实现其自身的需要和才能而设计和使用其劳动工具的个人。人们将破天荒第一次自由地、集体地行动，从而虽身处限制其自由和人性的必然性之下却又与之抗争”^⑨。

当马尔库塞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各自的弊端时，他还从科学技术对于实现“新社会主义”的作用角度，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

在他看来，虽然科学技术在其应用中服从于功利目的而具有强烈的工具性。但是，又不能否认科学技术固有的中立性：由于“机械使人的劳动力越来越脱离物质生产过程”，它的发展趋势，便是“最终有可能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⑩；由于“新社会主义”无论就其可能性还是就其现实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社会向“新社会主义”的过渡，便有可能不是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决裂”中，而是通过科学技术在不断地融合、自动地取消各自的对立过程中实现的，这时，“‘中立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变成正被其自身成就所超越的某一历史阶段的科学和技术——它已经达到了它自身的决定性否定”^⑪。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当马尔库塞分析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时，他同样看到和承认了前者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马尔库塞在其早期论文中，从历史回顾的视角指出，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才废除了与前现代的权威形式相联系的社会政治、文化，才有了两者在才能、文化上的根本区别^⑫。在《单向度的人》中，他从未来发展的视角，再次肯定了科学技术对于发挥民主潜能的作用^⑬。对此，安德鲁·芬伯格评价道：“当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技术持坚决的敌视态度时，本雅明和马尔库塞则在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民主的潜能”^⑭。而哈贝马斯在评价马尔库塞浪漫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时，一面赞赏“只有马尔库塞才把‘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当作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力量出发点”，一面又批判“在马尔库塞的论述中出现的那种摇摆性”^⑮，提到马尔库塞认为“离开了科学与技术本身的革命化来谈论解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⑯的观点时，更表明马尔库塞并未彻底否定，相反却是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

这样，透过马尔库塞科技理性批判的表层，可以发现，当马尔库塞承认科学技术是头号生产力，当他将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并从极端的角度严厉讨伐和尖锐批判时，却从客观性角度，证明和凸现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和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还在探寻“自然解放”之路时，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

在马尔库塞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但人的生存、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有可能，为此，需要人类抛弃技术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对待自然。但是，“自然是历史的一部

分，是历史的客体；因此，‘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这以后，手工劳动的某些失去了的质也许能够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出现”^④。这里，马尔库塞除了表明自己所反对的，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外，还以现实的而非浪漫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的肯定。

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在科学技术问题上，思考视域的双重向度：在客观效用层面，他承认甚至肯定科学技术对生产力乃至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在主体价值层面，他否定和批判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认为人类的进步和人的解放，不是科学技术所能衡量的，社会发展终究体现为人的发展，“即便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也不可能告知人们存在着任何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不间断的进步。这里，仍然是人自身决定着进步”^⑤。因此，只有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尺度和衡量标准，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在关于科学技术是否具有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的问题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陷入普遍认为的绝对否定的极端。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对于全面分析和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批判，还是对于今日中国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都是不无裨益的。

①②④ [美] 安德鲁·芬伯格著，韩连庆、曹观法译：《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5、40、40页。

②③④⑤⑥⑦ [联邦德国] 麦克斯·霍克海默著，李小兵译：《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2~3、5、5、6~7、6、3、6、7页。

⑧⑨⑩ 麦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24、96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德]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40、6、33、246、240、170、230、361、290、259~260、305、305、305~306、319页。

⑳ [德]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三部分第二章“自然历史”、“历史与形而上学”；第三章“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30、

205、6、8、11、4、18、53、17~18、39~40、209、204~205页。

④④⑦ [美] 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2、128页。

④④ [德] 哈贝马斯，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2、43页。

④④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02页。

作者简介：郑忆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祁程，上海市长宁区委党校教师，华东师大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博士生。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刘慧玲]